

社会主义与战争

——綜論中国对共处政策的批評

爱·卡德尔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出版者說明

南斯拉夫愛·卡德爾的這本書曾于1960年8月12日至20日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機關報“戰鬥報”上連載，同月由貝爾格萊德“文化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本書系根據該社出版的塞爾維亞文單行本譯出，并參考俄文譯本做了校訂。因時間匆促，且限于譯者水平，可能有譯得不夠確切的地方，公開引用時，請再核對一下原文。

1960年10月

目 录

一、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现实.....	6
二、关于南斯拉夫的“机会主义”和中国 的“激进主义”	13
三、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19
四、现代社会力量的量的对比和战争	28
五、共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	45
六、关于武装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60
七、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74
八、新东西中的旧东西	83
九、和平积极共处的涵义	96
十、什么是革命的,而什么不是革命的	106
十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抉择	127
十二、战争和社会主义	136
十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148
十四、原因和后果	160
十五、中南分歧	178

中国报刊和許多中国官員(包括最高級的国家 and 党的领导人)的講話,很久以来就充滿了对我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我们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积极共处的观点的各种攻击。

我說攻击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批評,尤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批評形式,而是以异乎寻常的狂热领导和組織的十足的政治攻击,其目的显然是不仅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而且也對目前政治运动的远为广泛的方面施加某种政治压力。的确,正是这种狂热表明了,問題在于远比中国对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不滿更为重要的某种东西,南斯拉夫是欧洲較小的国家,而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犯了最大的錯誤,无论如何也不能威胁到中国,或者給中国的社会主义造成損失。显然,中国攻击的压力是針對現代社会主义国际政策的整个战綫的,其意图是在今天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所面临的抉择中,硬把既定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今天所有的人都已經清楚,中国的攻击不仅仅是,也不首先是針對我們的,而是針對所有在这些抉择中不完全采取中国对外政策立場的社会主义力量的。

我們当然意識到中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因此,我們絕不願意仅仅从当前南中分歧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革命的一切方面。就是說,如果我們批評中国政策的某些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忽視

中国革命在現代世界上所曾起过的和正在起着的积极作用。我們同样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的事情，中国内部革命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异常强大的集团。在这种条件下所取得的胜利就在中国培养了很多有能力的革命干部，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队伍中大大地發展了自信感和必須独立地制定和确定革命道路的意識。只要革命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發展和进步，那么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非常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因素。然而，一旦这个革命想要以强力即政治压力把自己和自己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强加于人时，它們就轉而成为某种相反的东西，即某种霸权主义的形式。因此，在批評中国政策，特别是有关中国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攻击的某些方面时，我們并不想把我們的意識形态的观点提供給中国共产党人以代替他們的观点，而仅仅是反对把他人的公式强加于我們。这就是說，我們在原則上如同反对現代帝国主义殘余想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一样，反对那种隱藏在一个革命口号下的霸权主义。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分析革命發展时，从来不是主观主义者，这正是因为他們坚持以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待这种分析。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另一个国家的革命并不是一样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关系在一个革命中在什么程度上得到表現、保持到什么程度和以什么速度加以發展，而其他社会因素——諸如資產階級殘余、私有心理、一般經濟上的落后、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又起到什么程度的影响，这都取决于許多内部的社会因素和物質条件。革命口号依然存在而内容却在改变的情况并不罕見。在进行客观分析时，

必須力求將主觀的東西與客觀的東西分開，也就是說，我們不容許口號和政治宣言妨礙我們看到事物的物質本質。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說，中國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的抽象概念。社會主義也是具體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極為形形色色的量的關係從而也是質的關係得以表現的過程。換言之，在同一个意識形態的公式後面，可能有“許多”或“很少”的社會主義，“許多”或“很少”的非社會主義因素和成分。這種差別不是關於團結的任何主觀主義的藥方所能解決的，因為這種差別取決於具體的社會經濟結構和主觀因素的性質，而這些主觀因素也不是相同的，特別是在它們成為統治力量的時候，即使它們具有同樣的名稱。因此，認為某國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就意味着不再出現分歧以至對抗性矛盾的任何可能性，這是錯誤的。而如果因為我們不同意某國對某些迫切任務的看法，就“否定”該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也同樣是錯誤的。只要舊制度及官僚國家主義的強有力的因素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起着作用，這種矛盾就仍是可能的。這種矛盾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可能的，特別是在落後和保守的因素企圖借社會主義團結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名，以暴力強加於其他國家的時候。正因為如此，任何霸權傾向都嚴重違背世界社會主義的基本利益。

現代中國革命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社會的一切物質和社會因素都充分地發生着影響，使這一發展具有完全特殊的道路和形式，而內部的發展又有其國際政策方面的表現。我們當然不願意干涉中國的內部發展，但是，由於其國際政策的影響直接危害着我們和國際社會主義，我們不得不為作為中國目前國際政策基礎的概念的根源和真正實質加

以闡述，中国的反南运动就是中国目前国际政策的組成部分。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尽可能地避免論战，而只对攻击給予最必要的回答，这是出于一个簡單的理由，因为他們一直認為，正是在真正存在分歧时必须更強調那些能联合的东西，而不是強調那些分歧的东西。我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間对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国际政策的某些方面的看法的确存在着分歧。但是还存在更多的共同利益，首先是社会主义团結的因素，这种团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号召的。在这种条件下，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在显而易見和无可爭論地具有共同利益的各方面促进積極的合作，讓今后的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發展以及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討論来創造解决分歧的条件。况且，如果是从社会主义基本利益出發，那么，分歧不仅无害，而且是前进的規律，是思想斗争唯一可能的形式。

中国政策的制定者显然有着另一种意見。他們寻求的是压服，而不是民主地解决分歧，因此他們頑固地繼續进行无原則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對他們來說，批評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显然只是一項策略任务，它有着广泛得多的“战略目的”，使国际社会主义全部政策服务于他們的观点，也就是服务于作为这种观点基础的利益。

可是，我們并不希望成为这种对象，也不能允許任何人不負責任地，以“真馬克思主义”的名义，根据自己的需要來歪曲南斯拉夫政策的涵义，从而掩飾自己政策的真正涵义。我国人民有权了解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叫囂的真正理由，此外，問題不仅限于南斯拉夫，而是涉及到更广泛得多的現代社会主义的整套問題。因此就必须观察中国攻击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更深

刻的意义和最终后果，并研究表现在上述攻击中的政治方针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我想通过这本书对于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当然，我不打算谈诽谤、谩骂和谎言，因为它们并不能证明什么，而只是明显地说明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道德，这样，具有这种道德的人就向世界表明，在他们那里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处于非常低的发展阶段，而垄断式的万能感却占了上风。进行诽谤性的反南叫嚣的人显然认为，实力和形式主义地引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容许他们在为其政治概念和利益的斗争中可以极端无礼。尽管如此，这本书所分析的对象不应该是对于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攻击本身，而应该是产生这种攻击的政治思想的内在实质。因此，这次对中国的反南叫嚣的解释，首先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作为这一叫嚣的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的概念，是否象中国这种政策的制定者所断言的那样，真正是必然出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二，这种概念的现实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即它们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导致何处，而不管它们的制定者如何解释，即不管他们自己可能相信什么。

一、中国的意識形态和中国的现实

如果我們从許多空洞的詞句、誣蔑、玩弄字句的辯証法和一般的政治口号中抽出中国对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指控的眞正实质，那么这些指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論点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而他們的修正主义产生于他們害怕帝国主义和战争。这种胆怯促使他們奉行机会主义政策，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这样，他們就从同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清算的立場，降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場，并接受了资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理論。为了掩盖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美化帝国主义。因此，他們帮助美帝国主义。为此目的，他們就臆造了积极共处的政策，这个政策不是别的，而是掩盖其机会主义政策的手段。

第二个論点是：与南斯拉夫这种“机会主义”相反，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怕帝国主义，也不怕战争。他們主張通过革命冲突在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間进行徹底的清算。如果这是战争，那么这将是正义战争，不要害怕和否定它，因为牺牲将迅速得到补偿。其次，中国共产党人說，关于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世界長期共处的可能性的論断是幻想的和有害的。他們認為，上述两个世界之間的搏斗迟早是不可避免的。根据中国作者們的觀點，談論共处、裁軍和協商的政策等等，只是为了揭露帝国主义。但是，根据他們的觀點，把共处原則作为

社会主义国际政策的持久的、根本的原则会意味着在当前世界上抛弃解决社会矛盾的革命方法。根据他們的同一观点，今天談論通过和平方式爭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亦即使政权轉移到工人阶级手中，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无产阶级照例不能通过别的，而应通过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而且是荒謬的和机会主义的，因为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如此迅速加强的时候，这些国家不应放弃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清算的可能性，因而不應逃避战争。

从中国的眼光来看，如果把这些論点归結起来，就可以得出以下情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人是激进的革命家。这两个論点自然是从“眞馬克思主义”立場，从所謂不会錯誤的立場来証明的，并且引經据典随心所欲地解释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实际上这两个論点都是同样虛假的，都是企圖歪曲事实眞象，模糊分歧的眞正实質。

一眼就能看出，这种情况反映了对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原理的簡單化的和宗派主义的理解。此外，显然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眞馬克思主义者”与其說是对致力于馬克思主义有兴趣，不如說是需要有效地运用一种众所周知和声名狼籍的无原則斗争方法。也就是說，这是一个陈旧的和众所周知的花招，这个花招是从这样一个打算出發的：假如把一种进步思想称之为是自己的对立面，就能極为輕易地敗坏它的声誉和使其默默无闻了。然而，中国作者在应用这种手法时，显然是忘却了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象今天这样普遍的情况下，这种手法日益成为毫无价值的了。今天，社会主义思想已成为全世界这么多人和这么多民族的自觉的社会活动的内容。不管他們願意与

否，曾經獨斷地決定“真理”而為任何人所不敢檢驗的“偉大聖賢”斯大林的时代（以及整個個人迷信的时代）已經過去了。如果中國共產黨人重新借用這一声名狼藉的历史遺產，那將使自己受到損失。

現在我們來看看，事實同所描繪的中國“意識形態”的貨色多么矛盾。我們主張澄清社會主義國際政策問題，包括所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的分歧的真正實質。所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不是我們，而是中國理論家出于完全既定的原因把它與前一問題聯繫起來的。

同時，應該首先指出一個事實，即攻擊我國政策的中國作者，力求使這些攻擊在馬克思主義方面具有意識形態上和理論上分歧的形式。這種方法不僅是偽善的；而且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批評南斯拉夫的中國批評家（有意無意地）正在用這種方法來掩蓋事物的真正的物質實質。

當然，意識形態的分歧是有的。我們對攻擊南斯拉夫的中國作者的“馬克思主義”有着自己的看法，同時，我們既不認為自己在批評方面是不可侵犯的，也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正確的”解釋者。然而，僅以意識形態的分歧是不能解釋問題的實質的。

在迄今的人類历史中，意識形態的分歧最常見的有兩種形式。它們或者是在宗教—教理的抽象範圍內和在極狹窄圈子的人們中間沒有結果的煩瑣哲學式的爭論，或者是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矛盾的外部反映。在當代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中，我們會遇到這兩種形式的意識形態的分歧。然而，中國攻擊南斯拉夫的情況顯然是首先與第二種形式有關。

中国作者妄圖使馬克思主义淪为一种迎合具体政治需要的实用主义意識形态的模型，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归根結底，讓我重复一下經常引用的馬克思的名言：人們并不是他們自己所認為的那样，而是他們实际存在的那样。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对地球上任何一个生物都是同样适用的。無論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力圖以“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維護者来伪装自己，他們的意識形态就道出了他們自己的社会现实及其問題。而我們对这些問題的理解远远超过我們对这种“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国文章作者把这种“馬克思主义”降低到苦力的水平，使它不得不背負起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进行恶劣政治攻击的任务。換言之，對我們來說，問題就提出來了：从历史上來說，中国發起的反对我国对外政策和共处原則的运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耍笔杆的人，为了自己的日常实际需要而如此无情地發掘的那种馬克思主义，正好給我們提供了分析这一問題的方法。

当然，我沒有任何意圖去爭論，誰的“馬克思主义”更好，“更正确”，是“南斯拉夫的”，还是“中国的”，或者是某种其他的馬克思主义。正如每一門科学一样，馬克思主义是人人都可接近的，但是，某个人在实践中对这一門科学究竟接受了多少，則不能仅仅取决于他想成为馬克思主义者的願望。因此，我們并不指責中国的批評家利用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伪装自己的政策，像他們指責我們那样。但是，我們並不認為，誰的政策和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的引文来自圓其說，并把它作为“唯一的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以壟斷主义的方式强加于人，因为这种主观主义的辯解，即使是最誠意的，也只不过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已。

正如常常指出的那样，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对估价某个人的工作来说，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他为了证明某些行为的正确而找到了什么样相应的馬克思主义的引証，以及怎样主观地理解了馬克思主义这一指南，而是該項工作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效果如何。只有这一效果才表明，某人对于这一指南是运用得好还是坏。

此外，今天已经有許許多多的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以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很显然，当某人怀着成为“真正”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正的”体现者的野心而出现的时候，該是多么荒謬。馬克思主义在社会發展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科学發現，并且与此同时对分析社会矛盾，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自觉地指导社会發展，提供了划时代的科学方法。作为这样的馬克思主义，曾影响了和正在影响着社会意識的全部“范围”，从根本否認馬克思主义的人們直到宣称是唯一“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的人們。甚至現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也主要从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对它来说是真正新穎的和科学的东西，不管資產階級如何否認这一点。作为一門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意义，正在于它对現代社会發展所曾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广泛范围的影响。

因此，虽然馬克思主义是每个自觉的、先进的社会主义行动的必要武器，但相反，仅仅原則上接受馬克思主义或者原則上接受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并不能使任何人自动地成为最先进的或不犯錯誤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們的意識及其行动也是各种各样因素和过程交織起作用的綜合結果：物質的运动、思維的反应、个人的特性、傳統、多方面的矛盾和对抗以

及由于傳統形成的心理状态等等。馬克思主义并不使人們，也不可能使人們免受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馬克思主义也不使人們成为某种“绝对的”、独立于物質过程的意識的体现者。同每一种思想意識和每一种科学知識一样，馬克思主义是社会运动的因素，但不是它們的内部規律。因此，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是現在这样的，并不是因为它建立在馬克思主义基础上，而是因为它表現了在革命以后曾有發展或有可能發展的現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独特联系。在此發展中，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針只是巨大的——也是进步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換言之，当中国理論家站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批評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国际政策的概念强加于人的时候，他們这样做的奢望是想成为壟断的“真正”馬克思主义的解釋者。而实际上，他們只是以此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这一政策是独特的中国社会条件以及在此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傾向（它們在这种情况下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思想目的）的結果。把上述政策强加給別人的这个方式本身——中国反南运动最雄辯地說明了这一点——指出了—一个事实，該运动的發起人力圖在社会主义世界起壟断思想和政治领导的作用，也正因此，他們就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从屬於自己的政治利益。

首先讓我們来檢驗一下中国的論断，并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名論点来加以对証。請允許我在这方面比实际需要更多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当代一些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著作。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想以此証明“唯一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是我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我是想指出这样

一个事实：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政策来加以辯护，尤其不能作为有效的和进步的社会主义政策来加以辯护。既然該政策不能作为“馬克思主义”的政策加以辯护，就恰好可以根据馬克思主义来解释其原因和根源，并观察其社会历史后果。

二、关于南斯拉夫的“机会主义” 和中国的“激进主义”

中国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批評是从批評他們的特点开始的。这些批評家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害怕战争和帝国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的；就是說，因为前者缺乏勇气，他們就主張机会主义；而后者是勇敢的，他們就主張革命的激进主义。这真是对他人政策的典型的“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同时也是非常陈旧和很熟悉的方法：以虛假的革命詞句来掩盖極不革命的傾向。

看来，还必须再一次地向中国批評家提醒一个他們肯定不会不知道的事实：以自己的共产党和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工人革命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是非常罕有的运动之一。这一运动准备了，組織了，并手持武器，以自己的力量，即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希特勒欧洲的心臟中实现的，它不是号召劳动群众安于和平，而是号召他們投入战争。并且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已經投降占領者，已經同占領者媾和。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胜利，就不仅需要有革命的能力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誠，而且还要有很大的英雄主义和对法西斯占領者及国内反动力量进行革命清算的可能性的坚定信心。为了这一斗争，还需要具有必須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全面支持作为主要革命支柱的苏联的深刻的国际

主义信念。因此，中国的批評家很难能指望使世界相信，胆怯和机会主义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特性。

然后，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恢复其被战争摧毁的国家方面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同时又抵抗着那些企图用南斯拉夫内部困难来破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外反动力量的压力），他們又遇到了新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所引起和組織的。因此，又不仅需要許多革命能力和思想的坚定性，而且还需要勇气和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偉大的内部力量的深刻信念，这种力量一定会消除社会主义各国及其政策的發展中所出現的变态，以便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仅能抗拒压力，而且能維護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成果，使其进一步發展并巩固本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發展前景的信心。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就恰巧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批評家們也很难使任何正直的人相信：輕易地屈服于外来的压力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特性。

另一方面，正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这种偉大和勇敢的革命经历，以及他們在本国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或者从别人那里所吸取的經驗，使他們有可能不把任何“左派幼稚病”作为其勇敢和革命性的証明，也不把任何空洞的激进主义的詞句作为偉大的革命思想。一般來說，任何旨在使“激进主义”变为某种绝对原則的企图本身，就是不健康的思想情况的征象。这种企图在政治实践中是完全荒謬的，因为它不考虑客观条件，而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則是胡說八道，因为，它并不基于对现实关系的分析，而是基于抽象的思維結構或者甚至仅仅是願望。

只要強調这样的原則就意味着陷入靜止的主观主义。自